

關於香港與深圳兩制雙城互動演化發展的 進一步探討

王緝憲*

摘要：香港和深圳先後以英國殖民統治下的中國門戶港和中國改革開放後的經濟特區的方式出現，形成了兩個陸路相鄰、但在社會、經濟、政治制度上截然不同的特大城市。無論過程或後果如何，它都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城市發展奇觀。我曾在 2023 年 7 月出版專著，從演化經濟地理學的角度，對兩座城市如何相互作用和演變形成今天的奇觀進行了相對詳細的分析。重要的是，這個兩制雙城的互動演變仍在繼續，與整個粵港澳大灣區的互動也越來越多。為此，本文將進一步反思和解釋我新發表的作品中涉及的幾個核心問題。其中一個關鍵概念是「比較環境（CE）」。本文先解釋了香港和深圳的共同演化的特徵：頭 30 年是互補和依賴的，最近又轉向了不同的軌跡。因此，我進而討論了這種先趨同後分化趨勢的深層根源，並指

* 王緝憲，大灣區香港中心研究總監，博士 / 教授。

出，保持差異化的發展而不是一體化，恐怕是雙城雙贏的唯一出路，雖然差異化內容可以有很多種。

關鍵詞：香港 深圳 兩制雙城 差異化發展

1. 港深兩地與內地差異化發展的根源來自「比較環境」

1841 年開始英國將香港做成一個殖民化、貿易為本的城市，和 1979 年中國改革開放後在鄧小平、李先念等國家領導決策在深圳設市並成立國家級的經濟特區，其共同特點是由國家層面決定在一個特定地點，實行一個與周邊城市和地區有明顯不同的社會經濟制度。而深圳經濟特區之所以在深圳，又正是因為為了國家整體嘗試實現改革開放，需要把 130 多年前在這裏設立的香港利用好。因此，認真回顧這段歷史，特別是為什麼深圳可以在短短的四十年內崛起成為一個世界級大都市，便不難得出一個結論：兩個城市的比鄰而起，反映的是演化經濟地理學中的「路徑依賴」和「地點依賴」，而且是在一個非常特殊的情況下產生的，那就是由上級（國家）政府在特定的地點和歷史時刻，建立起了兩個制度上與眾不同的城市。這兩個「比較環境」，是後來經濟發展成功的前提。

然而，只有從地理學中的空間尺度角度思考才能注意到，這裏發生的路徑依賴和地點依賴，還涉及另外兩個地理尺度上的「比較環境」設定。一個是國家層面本身的特定制度及其演變。另一個是城市 / 特區內部的環境差異。在國家層面，如果 1949 年中國不是選擇跟從蘇聯建設該國定義的社會主義國家，那麼就不會出現 1978 年的改革開放，也就不會出現一個與內地所有其他地方都不同、先行先試地施行市場

化經濟制度的深圳特區。類似地，英國政府根據當時本國實施的最有利於商貿活動的法律體制，形成了一個特定的比較環境，讓香港從一開始就走上了「普通法」為本的一套重商、市場主導型的發展道路，雖然當時轉運鴉片到廣州以外的中國南部沿海城市是香港起步初因。在城市內部這個尺度上，深圳從一開始就有特區的「關內關外」之別，這就是「比較環境」之別。而香港也因為港英政府認為港島和九龍是「割讓」的，而新界是租來的，因此在投資和規劃上長期以維多利亞港灣為中心，集中投資和建設港島和九龍地區中與海外聯繫最便捷的區域。這是產生香港自身尺度上的比較環境和社會經濟發展之空間差異的根本原因。

在 1978 年後的 45 年間，多地理層次上的「制度比較環境級差」，除了最初的設計，無論是深圳還是香港，都得到了中央政府的特殊支持：深圳獲得「計劃單列城市」和「沿海開放城市」的稅務優惠地位；香港獲得以「基本法」體現的「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承諾，不僅確保了其在 1997 年回歸後的法律、經濟、社會制度基本不變，同時，香港特區政府在經濟決策上的獨立性和行政級別上（省級）的地位等方面，都有別於任何廣東省的城市。這一切都導致了「市場行為」在香港和深圳都比內地其他城市更活躍：生產要素特別是資本和人才的選擇性地向這裏流動，包括內資和外資，形成強大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動力。

生產要素在深港雙城這裏組合成發展動力，最終能否成功，要看它們是否可以成為全球化經濟和中國發展的關鍵環節。這一點需要不僅需要理解港深各自的角色，同時也需要分析兩個城市之間的互動演化的關係。本人在剛剛完成的著作（王緝憲，2023）中有一個圖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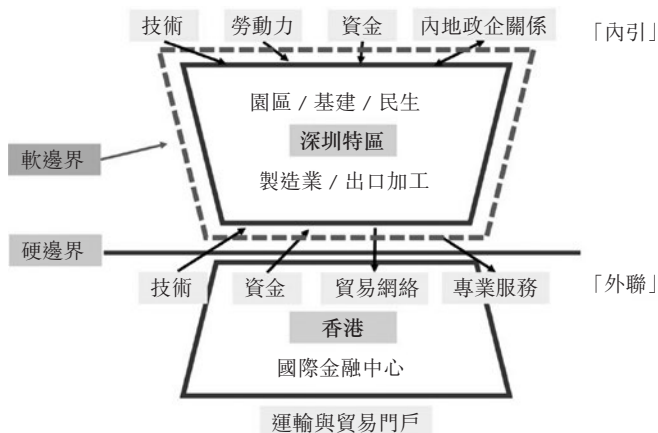


圖 1 深圳發展的動力結構：「內引外聯」的主要關係及香港在其中的作用示意圖

資料來源：王緝憲，2023，圖 4-2。

解釋深圳市成立以後「內引外聯」的基本特徵，以及香港在深圳這個架構和功能形成中自己的角色。

簡而言之，深圳以中國供應和全球化需求為本的崛起，不僅依靠了「比較環境」和路徑依賴帶來的要素聚集，還依靠了這兩個城市特定比較環境之間以及它們各自對外的兼容性。香港作為以普通法建立的有利於國際貿易的體制，兼容了國際市場各種標準和要求，包括要素流動的效率和企業及政府的誠信。深圳則不僅兼容了內地的法律，更兼容了中國內地各種行政體制、投資渠道、人才流動等方面的規範。同時，中央政府在深圳（特別是當年袁庚主政時期的蛇口工業區）實行後來被稱之為「先行先試」的模式，讓深圳盡可能地同時兼容以香港為範本的市場經濟系統。這種兼容性和比較環境，可以說是一個硬幣的兩面，缺一不可，因為它們必須同時存在才能讓這個兩制雙城形成的特殊區域成為聯動互補發展的成功案例。

2. 港深深度互補的同時走上不同發展方向的 必然性和根本原因

比較環境的差異是深港兩地形成過去幾十年高度互補發展的必要條件，但還不是充分條件。充分條件是深圳的發展對香港帶來的需求，以及深圳發展對香港的需求，因為有差異並不確保會對對方有需求。比如，香港與深圳一個重要差異，是有多個世界範圍排名很高的高等院校，特別是其中有不少是社會科學方面的學科世界領先。然而，深圳在這方面需求很弱，這一點與深圳自身發展的特點和社會發展階段以至於整個社會的政治制度和學術氛圍有關。

從演化經濟地理角度，更值得關注的是這種相互需求或者說互補性的變動，因為它折射出兩個城市各自形成的發展方向及其原因，並可能從而分析出兩個城市今後的新關係。本人在演化分析中注意到，可以將深圳和香港的互動互補作用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 1980 年到大約 1995 年。這個時期是媒體報導和學術研究最多的港深互動時期，因為從 1984 年左右開始，大量的香港企業家和資本進入深圳和珠江三角洲的其他城市比如東莞和佛山。由於獲得低廉的場地租金、勞工成本和政府對於加工出口產業的補貼，到 1995 年左右，香港本土製造業大規模北上，製造業佔香港整體經濟結構的比重大跌至不到 3%（目前不到 1%）。而同一個時期內，深圳迅速成為出口加工產品的製造中心的同時，其港口基本上仍是支線港。本人曾經估算過，當時每年超過 400 萬標箱的集裝箱經陸路運往香港葵涌碼頭這個當時華南唯一國際樞紐大港，然後海運到歐美市場。而負責尋找海外市場的也是香港和台灣的企業。「前店後廠」就是對港深這種互補情形的形象描述。

第二個時期是 1996 年到大約 2010 年。與第一個 15 年相比，這第二個 15 年，深港的互補關係出現了很多重要變化。第一是對外運輸。隨着香港碼頭經營商在鹽田港和蛇口地區的投資，深圳對香港港口的依賴明顯下降。第二，更多的中國本土的國企和民企在深圳成長起來，港資企業比重下降，貢獻也相對越來越小。第三，香港成為中國發展的融資基地，其中也包括越來越多的深圳公司通過在香港上市集資，獲得比內地融資成本低得多的信貸，這支持了深圳發展所需。這個故事的另一方面，就是香港在這個時期的金融及其他專業服務特別是廠商服務和保險業務得到了迅速擴張。很少報導和分析注意到，這一時期香港的經濟增長速度超過了其 1950 年代到 1980 年代工業化成就的「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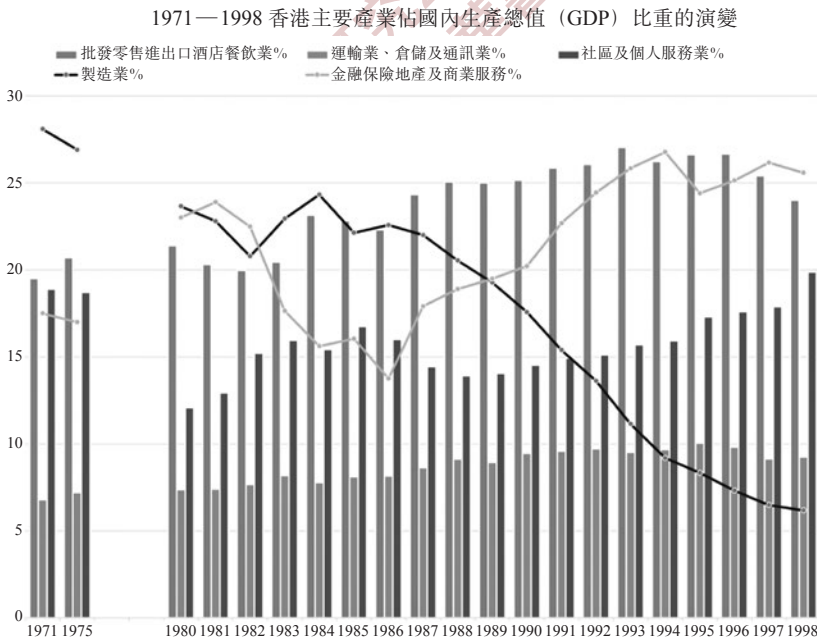


圖 2 香港工業化過程中後期（1971—1985）及進入後工業化的結構變化

資料來源：王緝憲，2023，圖 3-2。

洲四小龍」時期，可謂至今香港經濟最繁榮的時期。

也就是說，香港成功地轉型為國際金融服務 + 對外貿易中心與深圳崛起為中國最重要的電子消費品製造中心，是一個互補和平行高速發展的過程。

第三個時期是 2010 年至今。這個時期，從城市社會經濟發展階段和對外經濟關係兩個方面，香港和深圳都出現了影響長遠的漸變。首先必須指出，雖然深圳不論是城市化（城市非農業人口的迅速增長），還是工業化（製造業比重上升），都超常規的迅速增長，但按照實際常住人口計算的人均收入為尺度計算，其社會經濟發展程度至今仍與香港差距不小。從香港角度看，經過上一個階段金融及專業服務行業佔經濟的比重大幅上升和在中國國內大量的投資形成巨大的離岸貿易帶來的回報以後，香港社會的富裕程度已經進入發達城市水平，同時貧富懸殊更嚴重了。除了貧富懸殊和社會整體收入水平高以外，香港在 2021 年已經進入超高齡社會，即 60 歲以上的人佔了總人口的 20% 以上。人口平均年齡已經達到 46.1 歲（對比深圳的 31 歲）。因此，可以說，香港和深圳在產業結構、年齡結構、經濟發展水平、社會財富分配這四個社會整體發展指標上處在完全不同的兩個階段和層面。

2008 年的國際金融風暴，以及後來出現的加工業的大規模向東南亞和中國內地省份轉移，分別衝擊了當時的香港和深圳。香港社會的高齡化和收入嚴重兩極化，加上房地產租金昂貴和升職機會不足兩方面都使得上述問題更突出，導致香港進入了一個尋找辦法，解決社會新矛盾的階段。焦距到這個時期的政府管治，涉及了選舉制度等一系列敏感的政治問題，最終轉為政治風暴，在 2019 年進入了「一國兩制」2.0 階段。該場政治風暴和後來的新冠疫情衝擊，在某種程度上淡化了

表 1 深圳香港兩地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方面的主要特徵

| | 香港 | 深圳 |
|---------|--|---|
| 政治與管治制度 | 儘管 2018 年以後實施了「國家安全法」，「一國兩制」仍繼續，即按照「基本法」延續之前 20 多年的管治架構和特首選舉方式。與內地城市包括深圳在內最大的本質差別在於「普通法」基礎上的法律制度、信息自由、資金流動自由和更接近歐美國家的多項社會制度 | 政治體制與內地其他城市相同，從外部派任「第一把手」的機率高。延續中央政府給予的「深圳經濟特區」特殊管治環境，即在很多方面可以實施「先行先試」，保留了當年特區的「實驗室」性質。在政府架構方面有多級財政 |
| 經濟結構 | 已經完全轉型為服務業為主的城市，包括金融、房地產、旅遊、物流等，製造業僅佔 GDP 的不到 1%。金融中心崛起後，國際貿易樞紐和交通樞紐仍然是經濟的核心內容 | 製造業人口眾多，比重大，從貼牌出口加工業轉型為高增值的本地品牌製造業；同時內地市場比重增加，服務業也有明顯提升。與內地其他城市的經濟聯繫強大 |
| 社會特徵 | (1) 超高齡化（平均年齡 46 歲，年齡超過 60 歲者佔總人口 20%+） (2) 後工業化社會導致從業者基本上都從事各種服務行業 (3) 從移民城市變為熟人城市 (4) 有獨立的人口和移民管理政策，包括對與內地往來跨境人員進出的差異化管理 (5) 存在大量歷史遺留的問題，比如「丁屋」帶來的不公平。 | (1) 最年輕城市（設市 43 年，人口平均年齡 31 歲） (2) 處在工業化社會的中後期 (3) 中國最新和最大的移民城市（1800 萬人口的 84% 為新移民） (4) 與內地類似而又不同的戶籍制度 (5) 60% 以上的人口住在「城中村」，而且主要是新移民和勞動人口。「關內」與「關外」的發展差別大 |
| 文化特徵 | 大部分學校實行某種程度的中英雙語教育，特區官方語言也是雙語，各種文化和公共設施及其使用也努力體現中西文化交匯。不少中小學有宗教涉足管理，體現西方宗教系統之深遠影響。華人比例雖然在 90% 以上，英國統治期間留下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仍然處處可見 | 唯一一個社會上不講廣東話的廣東省城市，折射出本地文化特殊性和與廣東其他地方不同的省內外社會網絡關係。2000 年後大力發展高等教育的同時，年齡特徵導致互聯網文化影響大，體現在生活、職業，產品、服務各個方面 |

香港進入後工業化富裕社會的種種其他問題。從經濟演化角度看，香港內部以普通法為本的市場經濟制度並沒有改變，但因為國際形勢出現了「friend-shoring」（友岸貿易）這種美國或中國的歸邊式供應鏈發展趨勢，香港的金融市場和貿易渠道這些本來與國際社會完全銜接的核心競爭力受到了挑戰。同時，2020 年以後因為新冠疫情暴露出的護老院問題，也讓港人甚至外部世界清楚看到高齡社會必須面對的現實問題。

與此完全不同的是深圳發展路徑的變化。過去的 15 年，深圳在經濟向高新技術產品生產的轉型獲得很大的成功，而且這不僅僅是市場的力量，政府的手也一直有某種程度的參與，主要是主動選擇推進某些有比較完整供應鏈和關鍵企業的行業的「騰籠換鳥」或者升級換代。雖然由於政府參與的過程並不透明，市場又是「無形之手」，我們無法分辨兩者的具體作用，但是，有一點值得注意，即 2008 年以來的 15 年，深圳在國家層面沒有提出「內外雙循環」之前，其製造業就已經轉向以內地市場為主，雖然其電商出口業務在中國城市中名列前茅，並很大程度依賴香港機場的航空運輸。不過，雖然使用「香港通道」，深圳企業打開海外市場的「路數」已經主要依賴自己，因為香港企業對新產品的貢獻非常有限，而 40 年來深圳堅持從「山寨」和貼牌中脫穎而出到自有品牌，誕生了一批有創新能力的本土企業。除了可能受惠於從香港獲得的信息、資金和那裏培養出的科技人才，在技術和市場兩個方面，他們不再依賴香港遷移來的、但缺乏創新基因的傳統出口加工企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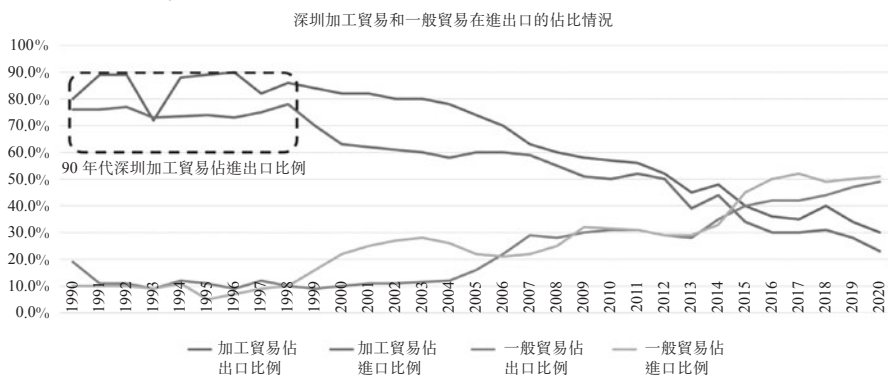


圖 3 本世紀以來深圳對外加工貿易額比重下降明顯

資料來源：王緝憲，2023，圖 4-4。

3. 多元、包容和嵌入式協同， 是打開大灣區多贏局面的必由之路

上一節兩個城市的差異化的演化進程，反映出兩個城市雖然都有與眾不同的「比較環境」，但隨着時間的推演，「路徑依賴」的作用開始發揮作用：從內地體制轉型而來的深圳，吸收香港「重商」和市場導向的一面之後，以其本來就有的各種內地網絡，華麗轉身開拓內地市場。而香港因為服務業為主的超高齡社會，重啟製造業，必須考慮人力資源和本地市場。而更重要的方面，是如何面對富足但公平性不足的種種社會甚至政治問題。香港在 2018—2019 年發生的事情，並不能都歸結為政治上和意識形態的問題，而是香港走到了一個很高的社會發展階段時，而 1997 年之後這 25 年，這個特別行政區的管治體系，完全跟不上這個社會對其的要求。當時那種特首制，實際上是一個「集權小政府」形態。國安法之後，也就是「一國兩制」2.0 版本出現後，正在形成一個集權的「中政府」，這是一個重要變革。我們假設，這種變革不會動搖「一國兩制」，但它仍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今後香港發展的模式。與此相反，深圳作為中國甚至世界城市化最快的地方，仍然保持 84% 的人口為新移民，面對的是如何建立一個充滿活力和特定製造業的持續競爭力的同時，儘快完善城市設施和服務。更有意義的，也許是在深圳變成「熟人社會」之前，建立起完善的社會法規和行為法則。不過說到底，目前政府和社會整體仍然是以經濟發展為第一驅動力的思維，這一點 40 多年來沒有本質變化。

如何在這種新的管治體制和外部形勢（這裏沒有篇幅展開）劇烈波動下，促成這兩個相鄰城市形成雙贏，並為大灣區的發展帶來正面啟示呢？

我們假設，兩個城市目前的發展方向對其自己而言是合理的，但有明顯的差異。那麼，在支持和維護「一國兩制」這個中央政府對香港的國策的前提下以及存在人口結構和經濟發展水平的巨大差異下，最重要的就是鼓勵多元思維和文化，提高社會內的包容度和城市間的兼容度，這樣才可能各得其所。

包容度指的是文化和思想層面，而兼容度指的是制度和法規方面。本人在近作（王緝憲，2023，第九章）中解釋深圳與香港在政府管理體制方面的巨大差異，並注意到兩者在包括政府架構方面一直在調整，以便兩個城市之間以及城市與上級政府之間在體制上的配合。在我個人以為，在社會和實際生活層面提高兼容度會對兩地人員、信息、資金和物資的交往和流動帶來更實質的影響，而到目前為止，這四個生產要素的跨境流動是非常不平衡的（參見王緝憲，2023，第八章）。目前已經通過企業實施的便利兩地交往的案例包括在香港使用「支付寶」和「微信支付」系統，在深圳使用 MTR 的「八達通」卡等。但一直沒有多少改變的是人員的不對等跨境流動。未來如果調整政策，出現「跨境通勤」，將對香港北部都會區的戰略規劃帶來極大好處。

然而，必須指出，這種通過兼容對方的各種系統的作法，是一種有競爭性的選擇過程，我稱之為「嵌入」（embedding）方式。它有利於基於市場需求的改變，並優化雙方合作和協同發展的環境。但是，這不是「一體化」，而是「融合」的方式之一。一體化是指合二為一，即較大程度上管理或者管治的統一化和內部化（internalization）。融合（integration）則是一個定義更泛的詞，因為它只要求通過某種融入的方式達到「合」的效果，但並不限制「合」的形式。因此，融合不僅可能有多種不同方式共存的情況下處理同一件事，比如在香港的個人消

費，可以用本地或者境外的國際通行信用卡，也可以用特定銀行的手機支付系統，如滙豐銀行的「PayMe」，還可以用內地的支付寶或者微信支付。這就是通過內地支付系統嵌入香港市場實現了多支付方式多跨境融合。如果這個消費方式「一體化」，就是指其變成了一家獨大的壟斷系統。但在城市發展、區域發展和產業政策的很多內地政府文件或者相關研究和傳媒報導中，「一體化」已經成為了不需要解釋的最優發展方向。例如，因為上有「強鏈、補鏈」的政府文件，一些大型企業考慮將自己不擅長的某些部件的生產內部化。也有諮詢公司向深圳政府建議，在深圳成立新公司，將香港機場歸屬深圳機場管理，以便更好發揮深圳機場的作用。這種假定「一體化」必然帶來正面效益的思維，無疑是對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錯誤認知。它的倡導者並不了解論證已久的「交易費用理論」的基本觀點。

不僅在理解和處理港深兩個制度不同、發展階段不同、社會結構不同的城市的關係上需要否定「一體化」必然正確的思維，在大灣區範圍同樣適用。發展差異巨大的九個城市和兩個特別行政區的進一步協調發展，必然要建基於它們的稟賦和制度的差異。以最需要合作和協同的減低碳排放行動為例，整個區域需要制定時間翻推式的共同目標，但每個城市都需要根據自己的情況，制定特定的行動方案。這種協同行動，恰恰不是通過管理體制或者管治方式一體化可以做到的。

4. 人員交流是多制共存之大灣區成功合作的最重要環節

從香港與深圳互動演進的過程中發現，多社會制度共存的進化方式，除了上述嵌入式的制度的系統兼容和標準化以解決在金融（如前面

講到的支付系統跨境設置)、信息(如容許企業在註冊後實現兩地間完整的內部信息流通)和物質(如統一過境貨運車輛和物品的檢驗尺度)外,最重要的是放寬人員交流的範圍和增加交流量。信息網絡化社會最大的負面效果就是超高比例無意或者刻意製造的虛假信息傳播,及其導致的各種誤解。這種影響在有信息篩選的地域之間最大。消除這種負面影響的一個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增加人員交流。

人員交流大致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旅遊,第二類是專業對口的訪問或調研,第三類是通勤或中短期的異地工作或學習。遊客雖然走馬觀花,只會到有限並且通常是商業化程度高的地點,但仍然有機會在一定程度上親眼看到所訪問城市的實際情況。第二類是與訪問者工作直接相關的訪問,比如深圳或香港政府中層公務員到對方城市的短期培訓和交流。他們有機會直接了解對方相應部門的運作和效果,甚至內部文化和氛圍。相比之下,第三類顯得更重要,因為這些跨境通勤或者中短期停留的員工或者學生有機會深入了解對方城市的方方面面。他們所帶回對方城市的信息,無論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都相對更準確,可以更有效的消除信息篩選帶來的負作用。

5. 結語

近幾年國際形勢的演變,很有可能改變香港在世界上的角色和深圳在中國的角色。儘管如此,從演化經濟地理學的角度,路徑依賴和比較環境(即對特定地點和特定制度的依賴)仍然會繼續起重要作用。因此,我觀察到這兩個城市正在走上越來越不同的發展道路。這一點,體現了各自制度環境背後的DNA,即基本社會制度和經濟制度的

要求與制約。同時，我的分析也說明，兩者對對方的需求雖然在不斷變化，但仍然強烈，因為兩個緊鄰在不同制度環境下所產生的各自優勢，有很強的互補性。這意味着如果期望今後保持一個雙制度下共贏的局面，本文強調的嵌入式融合和加強人員多方面和深層次的交流，形成跨境兼容的運作系統和思想包容的文化格局，以產生更有效的城市 and 區域管治和促成更多元化的發展機會，變得更為重要。相信這種思維，即臨近城市各展所長地形成自己的「生態位」(niche) (希瑟·海英，布雷特·韋恩斯坦，2023，第一章)，而不是抹平環境差異的「一體化」，對大灣區形成多贏局面一樣適用。

最後，一個地方演化中的生態位，可能會出現突變，例如 1979 年深圳從無到有，是由外部因素使然。如果中美關係的地緣政治影響下最終形成世界兩分局面，並導致香港必須選擇留在其中一個系統中的話，將削弱「一國兩制」的作用，不利於其中西橋樑功能。這不是我們期望見到的突變，但從演化經濟地理角度看，並非不可能。反之，幫助國家進一步擴大對外聯繫，例如成為中國與東盟之間的電商貿易樞紐，再如成為數字人民幣國際交易中心，則是香港的角色升級換代，對國家、地區和自身都是積極的拓展型演化。

參考文獻：

王緝憲，《世界級大都會——港深雙城的演化經濟地理學》，香港，商務印書館，2023。

希瑟·海英，布雷特·韋恩斯坦，《二十一世紀的進化論》，北京，中國紡織工業出版社，2023。

Further Study on the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of the Two systems twin cities between Hong Kong and Shenzhen

Wang Jixian

Abstract: Hong Kong and Shenzhen successively appeared in the form of some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forming two land-adjacent megalopolises with completely different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ystems. Regardless of the process or consequences, it is a unique urban development spectacle in the world. My monograph published in July 2023 provides a relatively detailed analysis from a perspective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about how the two cities interacted and evolved to form the spectacle they are today. More importantly, the co-evolution of the megalopolises continues, together with more interactions with the entir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GBA) , where Hong Kong and Shenzhen are located and playing key roles. To tap with this, this article will further reflect on and interpret several core issues involved in my newly published work. One of the key concepts is comparative environment (CE) . Noting that the co-evolution of the two land-adjacent megalopolises first became complementary and depend on each other, and recently have turned into different trajectories to the future, I discuss the possible main causes for such a convergent-then-divergent trend. I argue at the end, if the future development path could be planned, the role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Hong Kong and Shenzhen probably the only way that would benefit both, even if the contents of such differentiation may vary.

Keywords: Hong Kong; Shenzhen; Two systems twin cities; differentiated development